

“两山”理念改变中国影响世界

□刘广超

光明论坛

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提出20年。8月15日是第三个全国生态日,今年全国生态日主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安吉余村考察调研,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两山”理念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顺应发展潮流、引领文明进步的创新成果。这一理念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举旗定向,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实践,也为全球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世界意义。

生态之美,带来发展之变。“两山”理念重新定义了发展逻辑的内涵。“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论断,深刻揭示了只有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才能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如今的余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还成功入选了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评选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内蒙古库布齐沙漠通过实施治沙工程恢复沙漠植被,先治沙增绿,后产业反哺,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从城市到乡村,从湖泊到高山,从海岸带到内陆荒漠,我国生态地域场景发生了巨变。

“两山”理念突破了仅从生态学角度认识绿水青山功能的局限。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自然生态功能与经济价值转化相关联,使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生态功能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增值的绿色资产。如今,我国在12个地区开展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300多条生态旅游路线带来超万亿美元的市場,也成了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重要抓手。这些生态实践印证了生态资源是具有市场价值的,葱郁的森林、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也能变成一个流动的生态产品,让绿色生“红利”、让守护者有回报。

“两山”理念促进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方位革命性变革。这一论断强调发展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生态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为绿色发展确立了“生态优先、绿色为底”的核

心原则。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经济发展逐步摆脱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传统路径的依赖,绿色化、低碳化转型不断加快。中新天津生态城以绿色为笔,用16载实现从“盐碱荒滩”到“绿色新城”的蝶变;徐州市贾汪区洗去“一城煤灰半城土”的旧貌,换上“一城青山半城湖”的新颜……这些“城市变装”证明,生态治理不是成本的消耗,而是潜力的释放。

“两山”理念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远影响了世界。如何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长期课题。一直以来,不少国家在“发展必牺牲生态”的迷思中,要么为增长透支环境,要么因畏难停滞发展。“两山”理念突破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对立矛盾的传统发展范式,为大力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与实践借鉴。柬埔寨通过保护并增加红树林种植面积,积极推动沿海地区生态恢复,提升了渔业产量和渔民收入,并促进了当地生态旅游业发展;埃及近年来在沙漠中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将充沛的光照资源转化为清洁能源……这些实践正在重塑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越来越多的人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生态理念产生认同。毕竟,在地球这个“生命共同体”中,没有谁

能独善其身,唯有像呵护自己的家园一样守护共同的生态,才能实现永续发展。

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我国持续开展绿色国际合作,推动绿色生态实践,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我国积极参与打造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和快速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时间实现碳达峰到碳中和;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中国以积极姿态携手世界各国共建美丽地球家园,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

站在20年的时空坐标回望,“两山”理念的实践伟力已清晰可见。它不仅让中国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种新的文明认知——人类不是自然的统治者,而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方向。

(来源:《光明日报》)

保护野生鸟类，守护生态底线

□李玉峰

当下,“观鸟”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从城市公园到乡村田野,从沿海滩涂到内陆湿地,观鸟人穿梭于山林湖泊、湿地海滨,用镜头头追寻着飞鸟的踪迹。伴随着观鸟群体不断壮大,守护网路越织越密,珍稀鸟类频繁现身,观鸟经济敞开致富门。从观鸟到爱鸟护鸟,鸟类的生态赞歌,正被更多人谱写。

鸟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发挥着清理害虫、传播种子、授传花粉的作用,扮演着环境“清洁工”的角色,促进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默默维护着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同时,鸟类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也会导致它们的猎物或天敌数量发生变化,进而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某种鸟类的灭绝,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个鸟类种类数量减少的问题,而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生态功能的终结,潜藏着生态“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破坏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保护鸟类,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園;关爱鸟类,就是关爱我们共同的未来。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在谋求生存和发展中与鸟类结下了深厚友谊。家鸡的驯化是人类改造自

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极大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鸟类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早期文化中的鸟类图腾崇拜,还是唐诗宋词中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抑或是《百鸟朝凤》《天鹅湖》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

亿万年的事实说明,这些大自然的精灵,与我们人类息息相关,它们不仅是我们的亲密伙伴,更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近代以来,工业污染、城市扩张、森林砍伐、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等因素,导致鸟类的生存空间遭受前所未有的挤压。保护鸟类,刻不容缓。

作为世界上鸟类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有1500多种鸟类,其中候鸟超过800种,占比超过一半;全球共有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通道,其中有4条经过我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就加强包括鸟类在内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一系列重要论

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积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多维度推进鸟类保护行动。国家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2025—2030年)》《全国鸟类迁徙通道保护行动方案(2021—2035年)》《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2030年)》等,为全面开展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法律保障和行动指引。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鸟类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第一批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处,有效解决了保护空间碎片化和孤岛化问题,鸟类栖息繁衍环境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濒危鸟类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例如,1981年5月,陕西洋县发现当时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2023年,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达1.1万只,朱鹮栖息地正逐步向东亚历史分布地恢复。朱鹮的受危等级也由极危降为濒危。

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络不断完善,2024年全国水鸟同步监测结果显示,越冬水鸟总

数量达505.9万只,为迄今全国范围内监测数量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各地也探索运用科技手段,强化科普教育,加强栖息地保护。例如,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和西太平洋迁飞路线上的辽宁盘锦,每年迁徙停歇鸟类超百万只。当地建立2个监测平台,利用大数据对候鸟迁徙路线、栖息时间、种群数量等进行分析,对候鸟迁徙通道、停歇地、繁殖地等区域加强巡护值守,确保候鸟迁徙安全。

未来,我们还应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重要鸟类栖息地。积极利用“爱鸟周”“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等形式,充分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进行保护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提升公众保护鸟类的意识。积极参与国际履约与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鸟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万物各得其所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关注鸟类、爱护鸟类,共同守护蓝天精灵,定能让悠悠鸟鸣奏响美丽中国新乐章,让地球家园更加绚丽多彩。

(来源:《光明日报》)

特色产业集群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宋华盛

光明时评

今年以来,我国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通过产学研合作、政策支持等多种举措,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已建成33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培育出80家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00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和超1000家各类省级特色产业集群。

特色产业集群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并呈现出规模数量庞大、梯队层次完善、产业领域广泛等显著特征。制造业集群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再一个特征是区域协同发展,呈现“东部引领、中部崛起、西部追赶”的格局。具体来说,东部沿海成为产业集群核心高地,领跑价值链高端;中西部加速追赶。根据

相关研究报告,国家级集群东中西部地区分布数量分别为161个、70个、69个;浙江、山东、广东、江苏等省份的集群数量居全国前列。此外,城市群联动发展,集聚效应显著。比如,京津冀以北京人工智能和天津能源矿产装备为双核,大湾区聚集深广高端医疗器械集群、广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等产业集群。

我国特色产业集群经济效益显著,产业升级步伐较快,有效提升了区域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上海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以生物药和医疗器械为核心,打造国际化研发高地;杭州视觉智能产业集群聚集企业超万家,实现硬件迭代周期缩短一半;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产值规模超6000亿元,光纤光缆产量全球第一,强化了光电子产业链优势;洛阳高端轴承产业集群独占高铁轴承市场,推动产业链国产化与安全可控。

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方合

力作用的结果,有赖于政策支持与引导作用、市场需求与资源优势、技术创新与人才聚集以及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当前,产业竞争的范式正从产品竞争、个体竞争升级到产业链群和产业生态的竞争。作为集群形成的关键驱动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首先,协同机制优化了从上游原材料供应到下游销售服务的全链条运作,降低物流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加速企业集聚。其次,上下游企业紧密合作促进知识共享与研发合作,缩短技术迭代周期,强化了创新扩散与技术外溢。此外,龙头企业带动中小企业融入产业创新网络,形成共生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其牵引与规模效应。例如,浙江新能源汽车产业近年来快速发展,2024年已形成万亿产业集群,齐备完整的产业链和“链主—全链”共生模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产业链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形成和发

展,核心在于“融圈建链”。精准定位核心环节,通过分析产业发展趋势和本地资源优势,明确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围绕该环节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完善配套体系,构建从原材料供应到售后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同时,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专业化产业空间。强化龙头企业带动,通过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引导关联企业向龙头企业集聚,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协作的集群生态。加强创新驱动与人才支撑,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注重人才培养与引进,为集群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值得指出的是,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建设,重在“特色”二字。各地应着力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谋发展,打造细分领域竞争优势。科学统筹布局,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更多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产业集群,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我国产业体系加速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来源:《光明日报》)

“外卖卫星店”带来穿透式监管

□关育兵

有感而发

近期,南宁青秀区一家“外卖卫星店”受到网民关注。它不是传统堂食的后厨,而是品牌餐饮企业专为外卖订单设立的生产中枢——食材与主店同源,厨师由主店派遣,流程与堂食无异,进行“明厨亮灶”直播。

“外卖卫星店”的出现,在回应都市效率与口腹之欲的双重渴求之外,也为“无堂食外卖”这一饱含隐忧的灰色地带注入了新的“监督之光”。

“无堂食外卖”本是数字时代必然的经济

产物,它契合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却一度在野蛮生长中陷入“看不见厨房,安全有顾虑”的窘境里。这些隐匿于城市各处中的灶台,以惊人的弹性与低成本优势,满足了亿万味蕾的即时召唤。然而,规模小、更违频、监管难,使其成为食品安全的风险聚集地。对食材来源的茫然、对烹饪环境的想象、对安全认证的无力……这不仅消费者的无奈,更是悬置于外卖行业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外卖卫星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用“品牌化”和“透明化”两把钥匙,拧紧了食品安全的阀门。它绝非传统外卖小

店的简单升级,而是对餐饮业价值链的一次深刻重构。品牌背书将其优势凸显出来,将许多小店随意敷衍的投机主义让位于珍视羽毛的长远经营;标准化操作、与主店共享的供应链,则能够阻断劣质原料的输入。

尤其“明厨亮灶”的直播,将监督之眼由执法者延伸至每一位消费者,这既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躬身践行,更是餐饮企业将接受大众监督化为己觉行动。

“外卖卫星店”为平台与监管者勾勒出可行的治理路径——借力技术实现穿透式监管。外卖平台需将审核资源向规范

化、透明化倾斜,构筑“阳光厨房”的流量红利机制;监管部门要推广“互联网+明厨亮灶”的智慧监管,打通数据壁垒,实现从许可证照到食材溯源、从操作过程到用户反馈的全链条动态监督,让监管不再依赖人海战术的疲惫奔波,而是善于由数据驱动监管。

“看得见的后厨”照亮食品安全。当每一份外卖都能被温柔守护,当“舌尖上的安全”从美好愿景变为日常现实,都市人的每一次下单,才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确证,而非忐忑不安的赌注。

(来源:《广西日报》)

新华时评

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

共促南海稳定繁荣

□新华社记者 刘赞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21日在北京发布“南海真相”系列智库报告。报告回顾中国在二战后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的过程,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角度分析梳理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和在南海相关权益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揭露域外势力借南海问题在本地区制造分裂对抗的卑劣手段,呼吁地区国家排除外来干扰,通过谈判妥善处理分歧,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今天的国际秩序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奠定。二战后国际秩序体现了人类对和平发展、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理应得到维护和发扬光大。中国在二战中是盟国重要一员,在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正当权利,更体现了联合国宪章中有关领土完整的基本原则。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在二战后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

然而,近年来个别域外大国出于维护霸权的需要,在南海问题上挑拨激化矛盾、散布虚假信息、进行军事威胁;菲律宾等个别声索国倚仗域外势力支持,为实现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的企图频繁挑畔滋事,造成南海多次出现风高浪急的局面。这些行为违背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对世界和平的普遍愿望,背离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公然挑战。

中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既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深知,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包括南海周边国家在内的亚太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板块和主要增长引擎,得益于地区数十年来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南海生战生乱不符合地区国家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坚决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持与有关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坚持通过规则机制管控分歧,坚持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反对域外势力插手干涉。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目前正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与相关声索国就在主张重叠海域开展共同开发合作多次进行协商,并达成过协议;中国向地区国家提供海啸预警服务等公共产品,与地区国家开展海上合作……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同地区国家友好、团结、合作的意愿。也期待地区国家同中国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为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共同努力。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不吐不快

别再当文件转发二道贩子

□郭元鹏

日前,海南省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省纪委办公厅,对3起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其中,海口市区级党政机关重复发文,比如龙华区政府办公室、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重复转发同一通报,引发关注。

同一通报被不同单位先后转发6次,同一简报被同一部门重复转发3次——海口市龙华区一些单位的这一“操作”,看似公文流转中的小问题,实则折射出形式主义在基层减负工作中的顽固残留。

这种“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转发代替执行”的做法,不仅让基层干部陷入“收文—转文”的无效循环,更背离了为人民办事的初衷。

重复发文的背后,是责任传导的“虚功”和工作作风的“漂浮”。按理说,上级文件的转发应基于实际需求,做到“精准滴灌”而非“大水漫灌”。但现实中,一些部门将“转发次数”等同于重视程度,把“文件痕迹”作为工作成效,甚至为了规避责任大搞“层层转发”,却对文件精神是否落地、基层是否需要等毫无考量。正如通报所指,有的单位“发文统筹不到位、流程不够优化”,有的部门“多头重复发文”,最终让镇(街道)陷入“重复收文数量占全部收文数量的五分之一”的窘境。基层干部本应精力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却被迫在重复的文件处理中消耗时间,这正是形式主义对治理效能的直接损耗。

值得警惕的是,此类问题并非个例。从“扩大会议规格增加基层参会量”到“政务App功能交叉重复”,种种现象都指向同一个内核: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基层减负的理解仍停留在“喊口号”层面,缺乏系统性整改的决心和行动。他们嘴上说着“为基层松绑”,行动上却用“文山会海”“数字形式主义”给基层加码,根源在于“重痕迹轻实效”的作风尚未彻底扭转,“上下一概粗”的工作方法仍在惯性运行。

整治形式主义,需要“动手术”切除病灶。一方面,要强化刚性约束,严格执行文件“限额管理”“必要性审核”制度,对重复发文、无效转发实行“一票否决”,从源头减少文牍主义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要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各部门从“注重发文数量”转向“注重落实质量”,让“少发文、发好文”成为工作常态。而且,应树立基层评价导向,让基层干部对减负成效有话语权、评判权,避免陷入“上面减负、下面增负”的怪圈。

基层减负不是“一阵风”,更不能“过犹地皮湿”。打破“以文件衡量落实”的思维定式,斩断层层转发的形式主义链条,才能让基层干部真正从冗杂事务中解脱出来。

(来源:《广西日报》)